

## 【论 文】

# 二十世纪西北边疆与中国现代国家经验<sup>1</sup>

韦 兵<sup>2</sup>

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取径可能是要将其纳入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这一维度来思考问题<sup>3</sup>，这一维度包含众多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问题，现代中国边疆形成应该是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讨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中国西北边疆形成这样一个问题时，其实背后隐含了另外两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首先，一个帝国能否完整或相对完整地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其次，帝国的边疆如何转型为现代国家的边界？这两个问题引发出一个追问：现代国家的形成是单一路径还是多重路径？如果我们承认，事实上也必须承认现代化进程的多重路径，我们就会发现国家主导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特点。这种路径有其历史正当性，但蕴含了令人忧虑的危机。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过程，十九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国家的西北边疆的形成无疑是这一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层面，这一层面中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与特点都以某种方式被凸显、放大。边疆不再是遥远的他方，而是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现代中国是不同概念、不同范畴和不同历史际遇叠加后的结果。的确如孔飞力所说：“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并如此富有多样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sup>4</sup>许倬云认为：不论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作为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身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从古到今，中国经过无数次内外分际的“锤炼”，传统中国已经叠加、揉合了许多“他者”的成分，中国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生成性而非静止概念<sup>5</sup>。如果一定要定义，这种丰富性和连续性可能就是所谓的“中国性”（Chineseness）。在这持续的中国生成过程中，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近一百年以来，中国由一个王朝的“天下”演变为一个现代的国家的历程，姚大力先生简要的总结为“化天下为国家”，纳日先生描述为“将纵轴的天地平铺为横轴的世界”<sup>6</sup>。这一深刻的变革包括了帝国向现代国家过渡中政治、经济、文化、认同等诸方面、诸层次的转型。王朝体制与现代国家是不匹配的，这些古老的“装备”如何被利用、改造、整合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对身处其中的行动者，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问题。

作为现代的中国脱胎于帝国时代的天下，现代中国几乎完整地继承了帝国时代的天下，包括族群、疆界、文化、社会和以中央集权为代表的政治遗产等等。这一连续性是现代中国形成中的重要特性，西方学者对此无不表示忧虑：天下的多样性是走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威胁”。这些担

<sup>1</sup>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sup>2</sup>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sup>3</sup> 本文不使用容易引起歧义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这一概念，而使用“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这一兼容性更强的概念。民族国家是欧洲十八世纪才被完整表达的民族主义理想，作为一种政治原则主张国家的政治疆界和族裔疆界是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按此标准，现代国家中几乎没有民族国家，联合国中接近这种标准的也不过10%，大多数国家具有多族裔特性。使用这一概念极易产生单一民族国家的误读，而“现代国家”的概念强调不同类型文明的多元现代性进程和经验，更符合当今国际的实际情况。

<sup>4</sup>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联书店，2013年，第121页。

<sup>5</sup> 现代民族通常也具有这种复杂的混合特点，安东尼·D·斯密斯认为：“现代就像一幅覆画（cover painting），上面记载着不同时代的经验与认同，记载着各种各样族裔形成过程，早期的影响在后期又被修正，结果产生了我们称为“民族”的集体文化单元性质的混合物”（见氏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sup>6</sup> 这一问题还可参看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三联书店，2004年；赵汀阳：《天下体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忧或许是有理由的，如何在历史和传统赋予的多样性与现代性要求的均质性之间寻求平衡，这是一个难题。据说，“中国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Lucian W. Pye），现代化过程化文明为国家，难免削足适履之痛。麦克法兰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一思考：中国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他的物质进步有目共睹，但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有待规划，“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个性，屹立于风诡云谲的 21 世纪，一方面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类似于西方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凝聚问题：何种因素能将一个文明团结为整体？”<sup>1</sup> 麦氏所谓社会凝聚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如何在天下的丰富性中寻求现代国家的统一性资源。

从帝国时代起，边疆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边疆虽然地处边缘，但国家在边疆的所作所为对于整个国家而言非常关键”<sup>2</sup>，国家潜在地以在边疆的成功来寻求自我肯定。边疆其实一直是国家关注的焦点，尤其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边疆形成几乎包含了现代国家形成中所有的理想、难题、悖论和挫折，而这些困扰因边疆地区的特殊形势而被放大、被推向极端化。选择这样一个视角观察现代中国形成，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在极端状况下被放大出来的“典型”，正是由于这种边疆的放大功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困扰会清晰凸显出来，比如国家行政力量主导和国民主动认同的张力问题。这些都可能会促使我们反思基于中国经验的现代性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如何通过边疆建构成功感、自我肯定及合法性，完整、稳定的边疆是国家成功的标志。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在内亚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其表达路径与特纳的美国边疆（frontier）以移动性和征服性赋予美国持续的繁荣与霸权<sup>3</sup>，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作为想象中江、河发源地的昆仑，以及作为风水祖山、送魂终点的昆仑，西北边疆很大程度是古代中国人现实和宇宙论意义上世界完整性的保障，这是古人观念中想象的、素朴的、诗性的边疆。即使现代国家边疆形成之时，中国更多强调保住既有领土、免受列强蚕食，是一种防卫而非扩张的姿态，这又与特纳塑造美国民族性格的拓展的、现实的、血腥的边疆不同。

王朝时代中国更多带有诗意想象的边疆在现代性压力下如何转化为现代国家领土的边疆，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格鲁塞、拉铁摩尔、巴菲尔德们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中原视角的草原视角，这对理解帝国时代的中国极富启迪，但进入现代进程以后，游牧文明逐渐消失，正如巴菲尔德所言，“对准噶尔的征服终结了草原帝国的历史。在此之后，内陆亚洲的冲突将出现在两个依旧存在的定居力量：俄国和中国之间之间。持续两千年之久的斗争就此告终。”<sup>4</sup> 游牧世界的终点就是现代世界的起点，二十世纪初的内亚观察报告证实了游牧世界的衰败和绝望，中国古代游牧/农耕二元阴阳互动的天下终结了。现代化进程中，游牧的一维消失，中、俄两个定居文明，以及当时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帝国的大不列颠成为内亚的塑形力量。这三个国家的内亚经验既源于各自的历史与传统，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的现代化进程。就中国而言，充满挫折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强大的外部威胁，以国家力量主导，力图构建完整的基于历史和传统的现代国家版图，这就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最刻骨铭心的现代北部边疆形成经验。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脱胎于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古代中国；但在另外一些意义上，比如全球现代性进程的视角下，这也是一个与传统有相当断裂的全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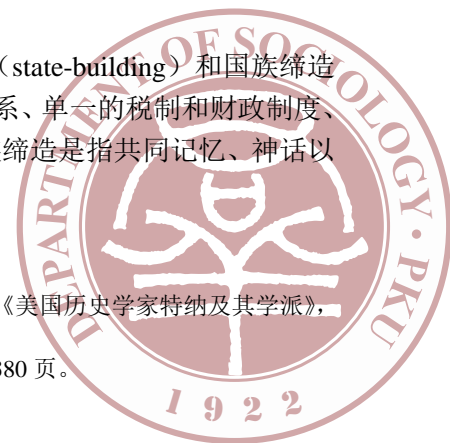
现代国家形成包括不同层面的内容，概括起来可分为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和国族缔造（nation-building）。国家建构是指全国建立统一的法律规范和司法体系、单一的税制和财政制度、统一的交通和通讯体系、中央管控下的有效军事组织和技术等；国族缔造是指共同记忆、神话以

<sup>1</sup> 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三联书店，2013年，第4-5页。

<sup>2</sup> 欧立德：《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

<sup>3</sup> 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黄巨兴（译）、张芝联（校），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38页。

<sup>4</sup>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0页。



及象征符号的生长、培育和传递，对共享的文化、知识、价值“可信性”的确定、培养、传递，对领土、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的界定、培养和传递<sup>1</sup>。前者属于现代国家的可见的制度“硬件”，后者强调主观认同，是现代国家统一性得以确立的观念“软件”。斯特雷耶在现代国家形成的研究上有精到的论述，按他的理解，现代国家产生要有四个条件：政治体制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长期维持；非私人的、相对永久性的制度；对最后裁决的权威需要共识的形成；忠于这种权威的理念<sup>2</sup>。前两条属于国家建构，后两条接近国族缔造。

斯氏观念强调现代国家要求统一性的方面。从体制层面来讲，为了实现国家提供安全、公正、价值感的基本体制保障的目的，国家运行层面的政治、经济、财税、通讯、交通的制度统一性是合理和必要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50年代以前的观察者在边疆看到是令人沮丧的挫折：1917年入疆的谢彬看到，名义上结束帝制，但距离现代国家的形成还比较遥远，虽然已经入民国数年，但从甘肃西部开始，武职概沿用清制，以提镇、协参、游击、管带、守府为名目。军队各自为政更严重，新军中湖湘、秦陇两派纷争不断，杨增新斡旋其中寻求平衡，招回收队马步五营，谢彬感叹：“足见我国军队，去国军程度甚远。迄今尤有岳家军、杨家将遗风”，军队国家化是现代国家体制统一性的重要标志，谢彬在这里看到的是严重的分裂和争夺<sup>3</sup>。土司、藩王权力依旧，谢彬认为这有悖于国家体制的统一性，很多地方谢彬暗示希望裁撤藩王权力。而且问题还有充满悖论的一面，取消伯克制度，地方权力统一于州县，这应该是清代促进新疆地方体制统一性的一种努力，从理论上讲是有益于现代国家形成的，但事实上不通当地语言、习俗的流官必须依赖翻译、头人来进行治理，结果这些中间人假威弄虐，上下欺瞒，无伯克之名而具其实，带来的混乱比伯克制度还厉害。谢彬认为伯克制度的一些方面任用本土精英，大小相维，分科治理，有成周里党、西汉乡亭遗风，与现代西方地方自治也有相通。王朝时代的旧“装备”在实际的治理中，具有其合理的实践价值，这在清醒的政治家那里是看的很清楚的，杨增新任用当地人，“参用缠回、甘回，不使阅其宗教”，一定层度回归伯克时代的本土治理，取得的效果相当明显。<sup>4</sup>现代国家形成实践包含这些过渡型、混合型的体制，这一特点可能会一直伴随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这种多元混合体制以及后来的一国两制实际反映了“古典中国”与“现代国家”、“天下”与“国家”间的张力，正如强世功所言这种现代转型其困难在于如何把一个“天下”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容器之中，如何在“国家”的架构中展现与众不同的“中国”<sup>5</sup>。这些纠缠于天下/国家不同经验混融的边疆问题带来的挑战，都要求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要更具灵活性和包容性。

此外，税制的混乱，印花税不按规范，欺瞒民众，多收税钱，此外币制、厘捐“紊乱极矣”，边境居民冒称俄人以求免抽税，“丧失国权，不一而足”。邮政简陋，伊利、塔城、喀什噶尔与俄国邮电系统连接并网，俄国人本来是想在新疆包揽邮电业务，后被民国政府收为国办，但“异常腐败，电杆时有折倒，报生手法生疏。电局收费电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从绥定以北，与俄国电报线并道而南，“彼则下夹石础，高插霄汉；我则高不逾丈，腐败倾斜。相形之下，欲哭无声，且有常梗不通，几同虚设。俄领事每笑比为骆驼电线，可耻亦可愤也”<sup>6</sup>。本来，税收、通讯的统一本来是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但民国初年的新疆在这些方面是很落后的，而且这背后还有俄国人的虎视眈眈，难怪谢彬流露如此强烈的感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疆省城高等法院，形同虚设，自建立以来，未办一案；地方各县，连名义上的法院也没有。省政府机关“长官眷属，各居署内，办公厅中，旧桌破椅数张，职员杳无一人，文书档案，亦不获见”，衙署正厅

<sup>1</sup> 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6-107页。

<sup>2</sup> 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sup>3</sup>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8、120页。

<sup>4</sup>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6、107、264、269页。

<sup>5</sup> 强世功：《“一国”之谜：中国 vs. 帝国》，《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年，第230页。

<sup>6</sup>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122、128、132、136、165页。





还烧香供着神像<sup>1</sup>，这无论如何令人不能接受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司法建制、省级机关。统一性等现代国家要素的缺乏在经历马仲英祸新的吴嵩宸那里得到了更加切身的体会，身处战乱纷争、生命堪忧的 1933 年的乌鲁木齐，吴嵩宸、冯有真都观察到各族群、各阶层盼望中央权威结束地方纷争的热切和希冀，以及事实上当时中央权威无力带来的挫败感<sup>2</sup>。

斯特雷耶对现代国家内部各要素统一性的强调这是基于欧洲经验的总结，如果承认，而且事实上也必须承认，现代国家生成具有不同路径，这种对统一性的强调可能被误读。在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经验时，上述斯氏四要素王朝时代的中国就已完全具有，而且王朝内在统一性虽不同层面有所差别，总体上说却相当高，但何以王朝体制不仅不能理所当然地推导出现代国家，相反，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充满艰难和悖论。这提醒我们思考现代国家形成的不同路径问题。简单归纳，欧洲现代国家的产生是一种内生主导模式，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则是一种外生主导模式。以英法为典型的内生主导模式中，除了上述四个条件以外，通过契约建立的立法、执法过程，以及以法治为基础的政体形式，这是现代国家的核心。

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所谓外生主导过程中，外在压力是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如果没有外在压力，王朝的“天下国家”估计会维持相当久远的时间，而不会主动向现代国家过渡。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强调的民族、主权、领土等观念，中国是在危机中被迫去辨认、理解、应对、改变，而生活在边疆的人们则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外在的规定。领土、主权概念要求确立边界并对界内居民的活动进行控制，但内亚延续千年的习惯性迁徙并不理会正在形成的国界的存在；中俄官方在边界设立特殊法庭“司牙孜”<sup>3</sup>，共同处理跨国案件。同光年间，中俄两次划界，中俄边界将哈萨克部落切割为二，但部落天然存在交往并不以后来国界的分隔而中断，“彼等不问国籍，往返如故”，1916 年俄国革命爆发，俄方哈萨克大量越过国界入新，杨增新一方面堵截，一方面通过外交斡旋促使俄方采取措施<sup>4</sup>。现代国家边界形成后，游牧地区的跨界问题仍非常棘手，内亚世界的族裔和国家都需要寻求适应。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又回到了冲击-反应的旧模式，但这里使用内生主导这一概念有特殊意义：首先外生因素不排斥内生；反之亦然，英、法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贸易竞争、战争、黑死病等外在因素不可低估。其次，外生引发的内生动力其强烈影响不低于外生因素，如二十世纪中国的国族建构运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外生主导的概念在这里主要用来探讨二十世纪现代中国西北边疆形成，在这一领域，无疑外生因素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促使所有的观察者都注意到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国家形成中国际地缘政治形成的生存夹缝：英、俄在中亚的争夺无意间为力量薄弱的晚清民国政府提供了一种生存夹缝，在列强间寻求平衡以维护主权。一战英、俄势力在新疆的衰落被谢彬、林竞观察到，他们积极主张利用这一机会加强新疆在制度、经济、国防等方面的建设，收回丧失主权，预防战后将卷土重来的威胁。新疆建省和阿尔泰地区划归新疆，这些很大程度都是在俄国在北疆觊觎带来的威胁而促成。同时，铁路的修筑不仅是一个交通问题，在西北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其维护主权和领土的意味是很明显的，借道俄国铁路到新疆的经历必然震动其内心，从帝俄一直到苏联，其铁路渗透中国边境更令人忧虑重重<sup>5</sup>。1934 年，黄慕松、

<sup>1</sup> 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1934 年，《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一辑）》，第 10 册，第 91、155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sup>2</sup> 吴嵩宸：《边城蒙难记》，第八章《黄慕松宣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85-92 页；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1934 年，《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一辑）》，第 10 册，第 157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sup>3</sup>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21 页。

<sup>4</sup> 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1934 年，《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一辑）》，第 10 册，第 53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sup>5</sup>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39、161、169、348、417 页；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73 页。



罗文幹代表中央政府巡视新疆之后，两件事情加强中央对新疆的管理：一是外交权力收归中央，中央外交特派员常驻迪化，驻苏联五个领事馆经费由中央负担，拟由中央派员；其二就是罗文幹向行政院递交《新疆善后以开辟交通为先务请择要次第筹办以资补救》的呈文，详细规划新疆交通建设，认识到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和国防密切相关<sup>1</sup>。修筑铁路这一情结深入谢彬等观察者内心，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一个情结。

二十世纪中期斯特雷耶理论对国家力量过分强调并不合现代主流学术的价值观，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威的主导性是不容回避的。中国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的边疆必须面对充满麻烦的中亚地缘政治。二十世纪初的新疆观察者都看到俄国在新疆势力强大，斯文·赫定在新疆就看到：“疏勒最有权势的人是彼得罗夫斯基（俄国领事），本地的沙尔吞居民把他叫做‘新札加台汗’”<sup>2</sup>。1934年冯有真看到中苏边境的实力悬殊的对比，中方苇塘子边境关卡只有二十几个老弱病残把守，边防“如同儿戏”，对面苏联巴图克边关，兵营房舍高巍，气象森严。苏联方面秘密与新疆金树仁当局背着中央签订《新苏协定》，金以片面通商、苏方估价换取苏联军事支持，苏联继承帝俄时代对新疆的经济特权<sup>3</sup>。二十世纪前期，俄国的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对新疆的掌控，在国家力量薄弱的时代，保有西北边疆的主动权不在自己，最终取决于国际形势和大国的利益平衡<sup>4</sup>。俄化中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观察者也注意到一战期间，英、俄深陷欧洲战场，放慢了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扩张，这给脆弱的中央政府一个喘息的机会，有识之士提出借此机会加强边疆国家主权的主张。这种外在性压力是中国现代进程中一个重要要素。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势既是帝国数千年行政管理经验的遗产，也是百年以来现代中国边疆形成中内外困境“倒逼”出来的路径选择。面临俄、英在中亚的强势扩张，边疆危机的步步深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其实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必须以国家力量集中资源、以行政主导方式构建社会组织，从而建立起确保边疆安全的国防、交通、通讯等基础。二十世纪初，不同背景的新疆观察者却无不赞同国家力量的强化；二十世纪中期，这种强化以社会主义新边疆的形势得以实现。或许这就是历史进程众缘所聚达成的路径。孔飞力意味深长地总结道：“如果将二十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向前迈进的故事”，而且“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下来”<sup>5</sup>。内外压力下的中国，在国家领土完整统一的理想下，凭借国家权威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sup>6</sup>。理解中国现代转型，理解边疆，国家这一维度极其重要，当然这里的国家既包括政治，也包括其历史和文化。

这种国家主导的现代边疆形成在危机的年代的确行之有效，但也要为此付出代价，留下了路径依赖带来的挑战，尤其在当代，国家权威主导更面临诸多难题。国家行政体制自身的僵硬、利益集团的操控以外，自下而上共同认同的缺失、追求简单粗放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社会解体及族群对立、环境承载与人口增长的刚性对立等等，都是边疆后权威时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反思国

<sup>1</sup> 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1934年，《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一辑）》，第10册，第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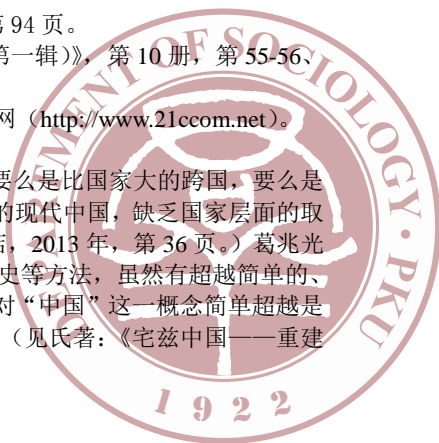
<sup>2</sup> 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开明书店1949年，上海书店复印，1984，第94页。

<sup>3</sup> 冯有真：《新疆视察记》，世界书局，1934年，《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一辑）》，第10册，第55-56、20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sup>4</sup> 相关论述可参考晁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sup>5</sup>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联书店，2013年，第119-121页。

<sup>6</sup> 据说，国家范畴在研究中已经“失宠”，失去学术界表述的前沿性，“得宠”的要么是国家大的跨国，要么是国家小的区域。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历史语境与传统，对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缺乏国家层面的取向是有偏颇的。（陈兼、陈之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者导言》，三联书店，2013年，第36页。）葛兆光认为，无论是强调地方性的区域史还是突出跨越国家边界的内亚史、征服王朝史等方法，虽然有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的意义，但历史研究中对“中国”这一概念简单超越是否合适？对持国家这一研究空间的学者是否就“落后”，甚至“政治不正确”？（见氏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30页、第34页。）



家权威主导的边疆治理是调整思路的前提。回顾二十世纪初，观察者都发现打着国家旗号进入边疆的各种势力都有自己利益的打算，无论是金树森、盛世才还是马步芳，口头上都有一套维护国家和边疆、促进革命一类的辉煌说辞，其语调大致相同，这些口号要么流于空言，要么实际上成为军阀谋求自身集团利益的幌子。表面的“建设”，并没有提供真正需要的，实际上却损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文化机理，造成了边疆社会的混乱和族群矛盾尖锐。中央政府如何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让其打着国家的旗号谋求集团利益，这是边疆治理长期的难题。同样，有些真正出于善良的意愿，如果没有执行的实践智慧，结果同样令人失望。这些都使本已复杂的边疆问题更添一层变数。

现代“国家”一词是这里用 state 来表示，是包涵了政体、制度、主权、认同等一系列多维度复合的概念；而在边疆地区，以疆域、领土等内涵来界定主权的 country 这一概念则被突出，以至于边疆研究中疆域、领土一直具有强势的话语，也因其显而易见的直接现实意义而受到关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边疆只看到边地、疆界是很不够的，有些边疆问题不放在一个更广阔视野下来考量是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在 state 的视野下，边疆这一概念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远方、边地，以及国家政体、制度、主权、领土等“硬”维度，尤其应该强调其所包括认同、感觉、价值感等“软”维度，这些更接近于家国情怀这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软维度与国族建构密切相关，毕竟国家建构最终要落实到对国家有深刻认同的具体的人上面。这些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经验共同呈现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边疆特殊地理历史环境里，这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边疆概念。如果从现代国家认同形成的角度，民国经验提供了不少负面教训。即便是杨增新，他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危机处理者，但他的观念和手段任然没有超越一个满清封疆大吏的范围。当然有人指责他主要靠高压和愚民政策治疆，这可能没有顾及当时的历史语境，但从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层面，杨增新和后来民国的治疆者的确鲜有贡献。

与认同形成有关的国族缔造 (nation-building) 是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维度，即使如斯特雷耶这样强调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内部各要素统一性的研究者，也发现自下而上的认同的重要性。他敏锐地发现，早期王国君主为境内民众提供了安全和秩序，这使人们产生了对地方的归宿感和对君主的忠诚感，正是这种归属感和忠诚感后来转化为对现代国家的认同感。德意志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对故乡素朴的情感建构了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经由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阐释和提炼，这被称为“乡愁”的哲思化感念实际上是当时德意志现代国家形成中自下而上的一种认同基础。姚大力先生在讨论多族群社会在现代国家中的认同时使用了“(共同的)历史家园”这一个概念，包含了兹土兹民在长久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传统、家乡、祖先、朋友、环境的深刻情感与认同<sup>1</sup>。

民国时代一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反思族裔隔阂、认同缺失导致的危机，民国初年的谢彬身份是中央政府官员，他的主要倾向是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统一性，但也对不同族群的境遇以公正观察、理解，他驳斥流俗，认为和田居民男耕女织，勤劳朴实，心灵手巧，所造地毯精美。途中路经之地，同治西部战乱给地方和民众带来的苦难给他很深的震撼，他对所谓“回乱”有不同的认识，“无识之徒往往自诩华族，贱视回民，诟为异类。不知今之华族，如北方金、刘、石、苻、元、李、安、萧、赵诸氏，其中皆杂戎种，又何厚彼而薄此乎？余愿秦陇士民，本张子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之心，蠲其小忿，厚遇回民”，“勿再逾墙，伤国元气”<sup>2</sup>。这段议论已经看到过分民族可能带来的对现代国家的不利，虽然谢彬还是同化的思路，但考虑到这是二十世纪初的议论，这已经很可贵了。谢彬所引述张载“民胞物与”也可以理解为隐含了同享一片天地，血脉交融的

<sup>1</sup> 安东尼·D·斯密斯在论及现代民族的区域性时认为：“人民和土地是通过共享的地形与统一的生态基础连接起来的，这种连接是对欢乐和痛苦共同体验与记忆的历史结果，这些欢乐与痛苦连接着所发生的事件与特定地点——战场、签订条约的情景、王子的住处、圣人的避难所、哲人的学院等等。正是这些河流的沿岸，哪些丘陵和山坡上，在这些谷地，‘我们的人民’诞生了，得到养育和繁衍；民族的地形限制了人们的认同内涵”（见氏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sup>2</sup>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共同家园的意味。差不多同时入西北的林竞在评论这一事件时，其观点思考就更深入，他看到“历次倡乱者，固多回民；而平乱者，尤多回民也”，所以简单将这一事件归于回、汉宗教斗争，于理不通。他认为，被回汉之争掩盖的至少有教派之争、官回之争、民匪之争几个层面<sup>1</sup>。这一认识提示了事件内部被掩盖的层次，如果只将其视为回汉之争，则宗教对立许多方面难以调和，而官民之争、民匪之争是属于治理层面的事情，可以通过制度建设和观念转变得到改善。这种认识，把宗教性对抗和世俗性对抗加以区分，强调表面宗教性对抗背后的世俗性，而在世俗领域，国家治理层面就可以改善对抗，比调停宗教纷争容易。这种“去宗教化”解释对建立一个有广泛认同的现代国家有重要启示。

抗战时期，面临外敌入侵，自下而上认同的必要被更切身体会到。范长江感到一些蒙古王公对日本入侵反映平平，与内地的同仇敌愾颇为不同，记者的职业习惯使他反思，这不能归咎蒙古人，国家并没有给蒙古民众福利，民众感受不到国家带来的公正、公平和价值感，他们对民国没有认同。范长江记录到派驻当地的一个国民政府特派员，得不到当地认同，被敌视排挤，孤苦无援，但又不屈不挠，这个小人物给人很深的印象，其实是国民政府在边疆形象的象征。他由此意识到建构共同的国族认同是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提出要有一部各民族认同而不仅是汉族的历史，寻求各民族对自下而上的国家认同，共同抗日，这在范长江的认识中是一个强烈表达的愿望<sup>2</sup>。吴霭宸抗战期间再次评论新疆问题时表达了类似观念，他批评王朝时期“只求边地纳贡内附，便即相安无事。各民族之疾苦，向鲜过问”，“夫土地、人民皆为立国要素，新疆土地如此广大，种族如此庞杂，已往之失地，由于平时之漠视疆土，一旦有事，听人宰割。已往之变乱，由于平时不顾各民族利益，一旦事变发生，纯用高压手段。今后之新疆，应先于斯二者加以纠正，注意边防，有备无患。凡百设施，应以新疆民族利益为依归，不宜只顾汉族自身利益也。”<sup>3</sup>化臣民、边民、教民为国民、公民与化天下为国家是同步的，这里面既包括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也包涵共同价值、情感、神话的培养。

黄仁宇、许倬云认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完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上半截”，即在中央政府、文化精英、城市经济的运行上是有效的，但在“下半截”的草根层面，在农村、在基层其运行是失败的。在边疆整合这一层面，国民党政府的运行同样是令人沮丧的。共产党政府是从基层革命发展起来的，四九年以后的共产党政府继续完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立的“下半截”，无论从体制上还是认同上，都大大推进了现代国家的建立。边疆这一层面，以阶级斗争这一超越民族和宗教的理想，统一了认同，在功能上形成了一个国族的共同认同。储安平等在新疆观察到：“规模巨大的诉苦运动发生了一股极其深刻的力量，它不仅初步地启发了各族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同时也初步澄清了狭隘的民族仇恨。许多民族群众开始明白，过去压迫他们的并不是一个汉族，而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sup>4</sup>。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的对立取代了族裔、文化的对立，寻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普世价值和王朝时代的天下理想有天然的亲和性，寻求普世的超越性也是广土众民的中国顽强的内在“语法”，给新中国以道德合法性的想象和自信<sup>5</sup>。虽然这种超越性的认同在今天看来显得很一般，但事实上是四九年以后中国现代国家建立取得的进展在边疆这一层面的重要体现。在建构共同认同这一点上，新中国初期比民国在处理中国的内亚性上更成功。边疆的这种成功也被普遍理解为新中国国家建设成功的一种体现。

当然，1949年以后自下而上形成认同背后也是强大国家权威的推动。在今天，阶级斗争已

<sup>1</sup> 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sup>2</sup> 范长江：《塞上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sup>3</sup> 吴霭宸：《边城蒙难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5页。

<sup>4</sup> 储安平、浦熙修：《新疆新观察》，新疆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页。

<sup>5</sup> 吉尔·德拉诺瓦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强调特殊性，他注意到：“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给这一雄心（民族解放运动）找到一条既是普世，又是特殊的道路：中国要发展，但是以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先锋国家来发展。”（见氏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第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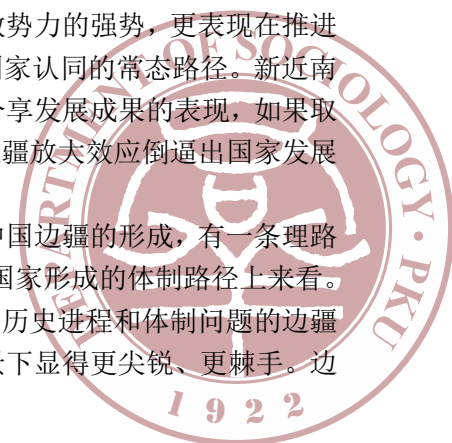


经不可能担任超越理想的功能，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国家权威路径依赖的体制下在边疆建立超越性认同。从政治上看，所有对国家的认同无不是以超越理想表现出来的，国家认同不是直接认同国家本身以及由此派生的诸如经济利益、社会建设等具体事物，而是需要一个超越性载体，需要培育共同分享的象征符号、神话、记忆、传统、仪式、价值观，以及和这些联系在一起的态度、理解和情感。在这样充分广泛的共享前提下，才能说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如果共同价值和认同缺失，加之粗放的经济增长和开发模式，必然导致的严重后果，在内地表现为唯利是图引发的价值危机和社会失范，而在边疆则可能是不同族群的对抗和分离。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极端世俗化的开发、“援疆”政策能否统和一个拥有普世主义神圣价值的文明，这值得我们反思。边疆经济开发中，如果利益集团借助国家行政资源谋取利益，单纯最求效益的粗放开发破坏边疆地区长久形成的人文肌理和自然生态，造成了边疆对国家的疏离感，这就陷入了国家资源被用于消解国家认同的怪圈，而且国家还将为所有这些后果买单。这也是无法抑制利益集团的情况下，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承担凝聚一个国家长久认同的原因。30年前，发展经济压倒一切是必然的选择，今天超越单一经济利益考虑也是一种必然，这一必然在边疆地区被放大凸显，或有可能倒逼出国家发展路径的反思与变革。

今天，我们尤其应当强调这些在国家权威主导下被忽视的 state 内涵中的“软”维度，寻求被普遍认同的现代国家的基本共性标准。我理解以下两点应该比较重要：（1）推动和融涵更广泛的、平等的政治参与意愿表达；（2）权力的制约、监督与利益的共享。现代国家的共性标准是必然趋势，在缺乏传统积淀和实践基础的前提下，把握国家主导控制力的最好时机，自上而下主动稳步推进，这是成本最小的变革。近代以来国家主导的现代国家建构这种历史经验和遗产，以及周边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力量在边疆治理中强势的必然性。不对边疆社会、文化、族群、环境、地缘政治以及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等多层次的问题有深刻长远的思考，没有对边疆社会和人民真正诉求的理解，没有巧妙灵活富于弹性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手腕，任何善良的意愿可能收到相反的结果。

所以，理论反思与实际治理之间还有一个实践智慧的问题，边疆建构与国家主导紧密结合，这是近代以来边疆政治的重要遗产，在国家权威有绝对控制力的时候，既尊重历史，又积极谋求治理方式的转变，这是最节约成本的一种路径范式，值得强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历史的惯性和路径值得政治实践者充分考虑，不顾及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简单从某种观念或愿望出发，以一种“新”模式取代既有治理模式，必然是一种灾难。学者探究理想与方向、提供问题多维度视角的思考，实际治理者需要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和效果，两者之间差异是明显的，但相互的尊重和理解对边疆治理问题的探讨无疑更有裨益。政治实践永远追求理想和现实的平衡，讲究出牌的理路、时机和次序。全国同步推进的最低生活保障与新农合医疗保障全民覆盖在新疆的推行，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与肯定，这是现代国家社会公平与基本保障建设的进步。这些并非专门针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得到了比某些专门针对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更广泛的支持。立足于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路可能优于特殊政策，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分享的成功经验应该在边疆地区更积极地推进、完善。国家力量在边疆治理中的主导既表现为对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的强势，更表现在推进现代国家制度完善和民生进步上的强势，后者才是争取民心、建构国家认同的常态路径。新近新疆地区实行的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就是现代国家民生进步、让普通人分享发展成果的表现，如果取得好的效果就应该在全疆推行，进而全国推行。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边疆放大效应倒逼出国家发展路径的反思与变革，反而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回顾这些二十世纪初的边疆观察者的记录，联系一百年来现代中国边疆的形成，有一条理路是清晰的：边疆的问题要放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来看，要放在现代国家形成的体制路径上来看。在中国，边疆问题有外在地缘政治及文化宗教的影响，但大部分仍是历史进程和体制问题的边疆式放大，这些问题存在于中国所有地方，只是在边疆的复杂内外背景下显得更尖锐、更棘手。边





疆问题的解决极大程度依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完成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边疆的困扰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困扰，边疆问题归根到底仍是一个中国问题。

## 【论 文】

# 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国家认同 ——维吾尔族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

郝雨凡、沈桂萍<sup>1</sup>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nation)<sup>2</sup>。民族国家构建，即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公民构建，国家构建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形成和确立，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构建；民族构建是在国家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民族或族群文化背景的民众中创造国族认同；公民构建是公民个人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构建。中国当下处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初级阶段，维吾尔族国家认同问题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课题，其核心任务是在尊重民族(ethnic)认同基础上构建以公民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使各民族成员共享国家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实现对国族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就是这一意义上的建设。

## 一、相关研究背景介绍

### 1. 时代背景

根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中国超过一千万的少数民族依次为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人口为 1007 万人，位列第四。维吾尔族 96%以上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居住在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一带和阿克苏、库尔勒地区，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改革开放后迅速发生的国际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带来新疆社会的剧烈变化，不仅直接冲击维吾尔族传统社会结构，也在重构维吾尔族民众的国家认同，甚至出现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相结合挑战国家认同的严重问题。经历了“7·5”事件和分裂势力的种种冲撞之后，维吾尔族国家认同现状到底怎样？是否出现国家认同危机？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先后于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库尔勒等地进行专项调研，结合其他学者相关调研，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 2. 理论背景

学术界虽然就国家认同见仁见智，但绝大部分学者认同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国家认同是抽象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既“我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也是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情感归属，即中华民族归属感，包括价值观念、道德体系、行为模式等文化因素的情感，是关于“爱国”与否的问题，由此，国家认同可以概括为“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sup>3</sup>。另一方面，国家认同是具体的利益认同和理性认同。主要表现为个体

<sup>1</sup> 作者简介：郝雨凡，澳门大学人文社会学学院院长；沈桂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

<sup>2</sup> 从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一切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都被视为“民族国家”(nation)，内部或许有多数 ethnic(民族或族群)。

<sup>3</sup>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第 9、12 页。

